



德意志的 另一行泪

“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



朱维毅 著

史书留下历史的躯干，
亲历者的记忆赋予历史血肉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德意志的另一行泪

De Yi Zhi De Ling Yi Hang Lei

——“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

朱维毅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朱维毅著.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11

ISBN 978-7-5100-2750-5

I. ①德… II. ①朱… III. ①二战—德国—通俗读物 IV. ①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0951 号

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

著 者：朱维毅

责任编辑：李 建

封面设计：星银河书装

出 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发 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100010 电话：64077922)

销 售：各地新华书店及外文书店

印 刷：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4

字 数：400 千

版 次：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2750-5/K · 22

定 价：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在我 1988 年首次出国时,德国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莱茵河两岸的风光,不是高速公路上的飞速车流,也不是和中国迥然不同的城市 and 民风,而是一座位于西柏林中心位置的特殊建筑——纪念教堂。因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座宗教建筑能够像这个教堂一样引发出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强烈联想。

主钟楼高达 113 米的纪念教堂曾是德意志帝国首都柏林的最高建筑,全称为“威廉皇帝纪念教堂”。这座带有哥特风格的新罗马式建筑是德皇威廉二世为纪念他的祖父——德国的开国皇帝威廉一世而建的。建筑的设计和施工均由威廉二世亲自督管,工程所需的 680 万金马克来自德国各省财政和私人投资,工程开始的年份选在德意志帝国统一后第 20 年的 1891 年,建筑奠基的日子 3 月 22 日是德皇威廉一世的第 94 个诞辰日……所有这一切,都为这座建筑罩上



图 0-1 柏林西区的标志性建筑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的今昔对比。1943 年 11 月盟军空军对柏林的大轰炸,1945 年 4 月苏军在柏林战役中的炮击,使纪念教堂受到毁灭性破坏,废墟之上只站立着已经被揭了顶盖的钟楼。1957 年,西柏林政府开始讨论重建纪念教堂的工程方案,大多数柏林市民支持把 68 米高的钟楼残骸部分加固保护下来。重建工程于 1961 年结束,纪念教堂从此成为一座向德国后人警示独裁危害和战争教训的独特建筑。



了一层超乎宗教意义的耀目光环,使它承载了铭记开国君主、展现民族自豪和弘扬德意志传统的意义。1895年9月1日,德皇威廉二世亲自主持了纪念教堂的竣工揭幕典礼。隆重的盛典令帝国一时轰动,新罗马式的建筑风格在全德随之风靡。

无人能够料到,这座建筑会在半个世纪后被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敌人的轰炸机和火炮夷为一片废墟。而这场由德国发动的世界战争的起点,正是纪念教堂问世整整44年后的9月1日。

战后,纪念教堂的残存部分被保留了下来并经过整体加固,它变成了一座汇集着辉煌与黑暗、胜利与失败、光荣与耻辱、骄傲与自省的永久性历史建筑。教堂的纪念指向已不再是那位完成了德国统一大业的开国君主,它无声却持久地提醒着人们永记一段历史:那场改变了德国和世界命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么,历经“二战”的德国人记住的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呢?

在那场空前的人类战争浩劫之中,德国周边的国家除中立国瑞士之外全部遭到德国的攻击和控制;德国的战争对手包括了欧洲的所有工业大国(包括战争后期倒戈的意大利)和美国、苏联两大国际超强力量;德军的进攻矛头北及丹麦、挪威,西指英伦三岛,南抵北非沙漠,东至莫斯科城下,其军事扩张的规模和韧性几乎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德国国防军开世界战争史中装甲闪击战和空降兵作战之先河,发动了空前规模的陆军围歼战、城市包围战、水下潜艇战和空军大会战,并且在人类战争史上首次把导弹应用于实战……

这一切都注定了世界和平力量在遏制和挫败德国的侵略行为时必然要付出沉重代价。

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世界性战争——“二战”期间,全世界先后有53个国家对德国宣战;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和残酷的战争:仅在欧洲的死亡人数就接近4000万;

这是一场把德意志民族推向绝境的战争——320多万德国军人死亡,210多万德国平民死于空袭,1100多万德国男子成为战俘,200多万德国妇女遭到强奸,德国的161个城市和850个村镇遭受了毁灭性轰炸,无条件投降后的德国丧失了一切主权,1200多万东部地区的德国人和境外德意志族人在战后被迫放弃世代家产,被驱赶到胜利者留给德国的那块缩小了1/4的土地上……

德国发动的“二战”对人类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1945年后的国际秩序和关系的建立,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立和冷战,人类的现代价值观定位都和这场战争的结局紧密相关。正因为这样,世界各国发表的“二战”文献浩如烟海,涵盖了史实记载、战役分析、罪行揭露、名人传记以及文艺作品多种形式。但迄今为止,很少有人能够说清楚德国普通军人及其亲人对“二战”的感受。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战败的德国一方,而从血海中幸存的各国受害者在追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往往很难顾及到加害国大众的遭遇和心境。另一方面,陈述、分析和总结战争的话语权从来都掌握在战争的获胜一方,战败国百姓的故事和感受从来都不大可能被纳入主流的历史视域。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是,如果世界对德国的“二战”亲历者的战争感受缺乏了解,人类对“二战”浩劫的洞察和总结就说不上全面和完整。

由于欧洲的战场远离中国,我们基本上只能依靠文字、图像和影视史料来认识战时的德国。年轻的中国人能够想象到的德国军人形象几乎是一致的,那是一群头戴钢盔、面目凶恶、强悍善战、惨无人道的战争机器。被群体固化的“鬼子”形象,让我们难以识别他们在性格、身世、思想、经历上的差异。他们是如何经历和认识“二战”的?我们对此几乎毫无了解。他们的个性



鲜为人知,他们的故事鲜为人听,他们的思想鲜为人道。在德国以外的各国看不到被翻译成自己母语的德国老兵回忆录,在“二战”史书中很少谈到普通德国士兵的命运,在一切纪念“二战”重大历史事件的场合上更不可能有德国老兵代表的身影出现。这是造就历史而又被历史忘却的一批人,这是真实存在而又在公众视线里消失的一批人,走近他们,就文学而言是一个独特的创作领域,就研史来说有利于更全面地总结“二战”,由此我萌发了接触并记述这些德国老兵的经历的想法。

自1945年以来,全世界揭露纳粹德国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文献已经堆积如山,在这方面继续落笔无非是重组各方信息,并无多少新意。另外,与日本不同的是,德国在战争中所犯的罪行在战后得到了严厉而充分的追究和清算,德国自身也对其历史罪责进行了全面、深刻、充分和持久的反省。所以,本书的写作重点不在于列数纳粹德国的罪行,而在于展示普通德国参战军人及其亲人对“二战”的记忆和解读。

作为“50后”,我对“二战”的了解尽管是间接的,但一直对之充满了探究的兴趣。我的父亲是一名新四军敌工部的老兵。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听他讲抗战故事,并从中最早听到了“斯大林格勒战役”、“诺曼底登陆”、“攻克柏林”这一连串名词。它们对我来说充满了历史传奇色彩,而对当年的父亲来说却是命运攸关的重大事件。在中国的抗战处于最艰苦的时候,新四军在时事学习中最关心的就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到德国以后,我强烈地意识到那些当年曾与苏军和盟军横刀相向的德军士兵中的一部分人就生活在我身边,这不能不让我产生接触和了解他们的冲动。在别人眼里,他们是一群或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或坐在轮椅上被人推行,或在超市里蹒跚行走的白发老者,但我却很容易联想到他们当年的军人形象:风尘仆仆,一身戎装,头戴M40型钢盔,肩挎K98式步枪……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萨尔布吕肯市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在老房东和他的几户老邻居家里都看到了他们年轻时的军人照片。老房东向我解释过:“到了战争后期,德国的后方已经没有了男性青壮年,你今天能见到的老头全是当年的军人……”

老兵们生活在我周围,但和他们深谈“二战”的话题却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事关那场不义的、以惨败而告终的战争,事关个人的痛苦遭遇和家庭不幸,他们是很难向一个相交不深的外人敞开心扉的。局外人难以想象的是,德国的“二战”反思会在德国老兵和他们的后代之间形成一道交流的鸿沟。年轻的一代人在中学教育中就可以系统地了解到自己先辈参与制造的那段黑暗年代,儿子不愿保存老兵父亲的战争文物,孙子不愿倾听老兵爷爷的战争经历,这在德国是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在后人的批判性眼光下,老兵们也倾向于对自己的“二战”经历采取谨言慎行的态度。当他们面对着一个外国人的采访要求时,这种态度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强化。

除此以外,另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时间。书写“口述史”的基本前提是要有历史见证人在世。但即使是在1939年“二战”开始时刚20岁的德国人,到现在也都进入古稀高龄了。依然健在的“二战”德国军人越来越少,当年将校级军官已基本绝迹,一代人正在悄悄地退出历史。要进入这个写作领域,只能抓紧有限的几年时间。

进入老兵的世界,首先需要奠定一种交流的基础。为此,我查阅了很多由德国老兵留下的战争回忆录。由于这方面的资料很少被翻译和介绍到德国以外,读来令我耳目一新。但我同时也遗憾地发现,凡以书面形式出现的老兵回忆录大都缺少鲜明的个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在把历史诉诸文字时,其思想表达毕竟要比说话来得更为谨慎,在事关敏感话题的时候尤



其如此。

我在1989年曾经和一个快言快语的老者聊起“二战”。老人19岁时曾作为德军坦克兵参加了从比利时的阿登山区突入法国的闪击行动。说到那场战争,他居然至今还是豪气万丈:“扫平西欧大陆,把英国人赶回海岛,我们一共才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德国最后输掉了战争是因为战线太长,树敌太多。如果只是一对一地干,我们不怕任何对手。”这种脱口而出的心里话是绝不可能见诸于文史书刊的。这更加使我感到,要真实地了解德国老兵和他们眼中的战争,必须要和他们直接对话,要让他们敞开心扉,用国内流行的说法就是要“零距离接触”。

生活在德国的十几年中,我先后接触过很多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老人,其中一面之交者居多。和有些人虽说经常能见面,但也不过是在楼道或街区碰上后面打个招呼。但只要出现交谈的机会,我都会不失时机地想办法从他们口中“掏出”一些对战争的感受。最初的动机不过是出于对历史的好奇,后来逐渐地就变成了有意识地收集故事。由此获得的材料虽然支离破碎,但积少成多后就使得那场战争在我眼前逐渐变得生动和真实起来。当然,依此还不足以成书。在我对德国老兵心中的“二战”积累了一些感觉后,我决定开始进行正式的采访。从这时开始,我真正感觉到了写这样一本书的难度。

我曾经试图通过德国的各类研究第三帝国史和“二战”史的协会和机构建立采访渠道,但没有取得任何收获。德国人在拒绝求职时很直接,但在拒绝求助时则很委婉。他们经常是不直接回绝我,而是很热心地推荐我再去找别的单位试一试,而且会给出一些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推来推去,结果经常是最终又让我返回到了最早联系的那一家,由此形成一个无效循环的大圈子。一次例外的情况发生在斯图加特市的一个老兵协会,会长在“二战”时是一名空军军官,老得已经写不成信了,他委托助手给我发了一份传真,表示将要提供给我一个老兵会员的名单,我可以根据这份名单上的电话和地址逐一去联系或采访这些人,但此事最终还是没有了下文。后来我了解到,老会长做出这个承诺后不久就去世了。

一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要找到采访对象的最佳途径可能还是通过对方能信得过的人来引见,这种引见的角色是各种协会和机构所不愿承担的,因为他们对你的写作动机并无丝毫认知。这个建议启发了我,我开始尝试在朋友圈中寻找引见人。这个过程虽然艰难,但最终证明是有效的。在热心朋友的帮助下,我终于接触到了一些愿意和我闲扯过去的老兵,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2002年2月举行的一次老兵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是在德国西部的布隆贝格市(又称花山市)举行的,由当地的退休老市长和他的夫人一手操办的,主题是“老兵忆‘二战’”。

以下几个特点决定了这个座谈会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发起者是一位前中国留学生,组织者是一位前德国政治家,到会者是8位前德国军人。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8位老人中有7位是自己开汽车前来赴会的,6位正式着装,打了领带。他们保持着军人严格守时的习惯,约定的10点钟刚一到,一群老头就脚跟脚地进入了会场——组织者老市长家那宽敞洁净的客厅里。这些老人在战争中的经历各不相同,其战时加入的军种包括了陆、海、空三军和纳粹德国的“第四武装”——党卫军。

在举办老兵座谈会之前,细心的老市长建议我把采访工作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先座谈,请大家扼要介绍一下自己的战争经历;第二步再家访,即根据在座谈会上了解的情况,挑出几个有故事的老兵进行单独采访。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任何一个老人在回忆过去时都会有无穷无尽的话题,3个小时座谈会能提供的时间毕竟太短了。对我来说,除了要在这个座谈会了解与会



者的各自战争经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体会相聚气氛,感受相互关系和观察共性的东西来获得一个对老兵的群体印象。座谈会的气氛很平和,除了话题的特殊性以外,它和德国一般的聚会并无二致。原因再简单不过: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德国老兵的内心世界神秘而遥远;而对这些战争亲历者本身来说,他们是一起参军、一起打仗、一起被俘、一起重建家园的同一代德国人,说起那段历史来就像聊家常一样自然。这次座谈会使我对德国“二战”老兵这个群体有了一个基本判断:作为德意志民族延续过程中特殊的一代人,这些老兵们在民族秉性上和他们的前人和后



图 0-2 2002 年 2 月在布隆贝格市举行的老兵座谈会。到会的 8 位老兵来自“二战”时期的德国海、陆、空三军种和党卫军,曾分别在西欧、北欧、苏联和大西洋海域作战。照片中这 5 位老兵全部是正装出席座谈会,而且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份简历。截至本书截稿之时,他们中间有 4 位已经去世。

代并无本质上的差异。他们的独特之处只在于,特殊的历史境遇造就了他们特殊的命运。

由于“二战”带给德国军人个人命运的撞击过于剧烈,老兵们对那场战争的记忆之深刻远远超过一般老年人对过去经历的回顾。尽管时光已经流逝了半个多世纪,但大多数我接触过的老兵都能随口说出自己入伍、负伤、被俘和回家的具体日期,详细到了月份、日子、上午还是下午、晴天还是下雨……

在我的所有采访对象中,没有人为其战争经历而骄傲自豪,也没有人流露出负罪感。发动战争的德国已经付出了足够代价(其中包括人员的死伤、城镇的破坏、赎罪式的战俘劳动、对受害国家的赔偿),这使得这些当初在“为国尽职”信念下走向战场的工人、农民、学生如今的心态十分平和。而他们在对自己曾宣誓效忠过的纳粹元首的谴责上所表现出的一致性又使人相信,这些当年的军人已经真正悟透了专制独裁和侵略战争会给平民带来何种命运。

采访工作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时为了一次约好的面谈我要专程驱车数百公里;有时为了补充材料我要对同一个人多次拜访(而进入德国人家庭的谈话预约经常是很困难的);有时我为了搞清当事人讲述的某一场战役或一个事件,必须在采访后查阅大量资料……对于我这样一个工科出生的业余写作者来说,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我之所以能一直坚持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从采访中获得一种特殊快感,那是在切入历史进程时体验社会发展脉搏的感觉。

在和老兵们的接触中,我经常能够听到他们对自己的孙辈和重孙辈的介绍,这些孩子们有的痴迷于电脑游戏,有的热衷于异国时尚,有的成为国际文艺、体育明星的追随者,在价值观上



已远离他们的祖父或曾祖父而去。而当这些老人向我展示他们祖父母的照片,甚至是曾祖父母留下的信件时,我又会被带进更远的德国历史,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铁血宰相俾斯麦主政的年代,甚至是普鲁士王国征战丹麦、奥地利、法国进而一统德意志帝国的时期。这是一种从历史书上无法获得的对社会延续发展的一种直接触摸感,它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是人类发展,什么叫世代更迭。尽管我的观察比较表面,而且间接,但我毕竟获得了一种上下纵观德国六代,甚至七代人的独特感受。这对我真正理解德国老兵及其后人(当今德国社会的主宰者),以避免简单地图解他们的经历有着极大的帮助。依据这种感受,我就可以为本书选择最能从本质上反映“二战”时期这一代德国人特质的采访素材,从而使读者在获得一些知识的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触摸到将德意志人代代相连的那种独有的民族气质,而后者往往是认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想钥匙。

在200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写的一些德国老兵回顾“二战”的纪实文学作品在国内陆续发表。其后,我在一段时间里没有再把创作的笔触伸入这个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我采访过的老兵一个个地离世了。那些在每年圣诞节前都会和我互致问候的老人一旦停止邮寄贺卡,往往就是不祥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把电话打过去,得到的通常都是老人已去世的消息。这让我感受到一代人从历史淡出的过程。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人类世代作为的记录。

现代是什么?现代是人类世代作为的效果之和。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任务,无论他们最终留给后人的是遗产还是遗憾,真实地为后人留下自身的历史是他们不可回避的责任。这是一种意义深远的、不存在国界之隔的传承,口述史则是这种传承的重要形式之一。而从总结战争教训的角度上看,由战败国的普通人留下的口述史比胜利者的历史追忆更为重要。面对正在消逝中的一代德国老兵,我觉得自己应该在以前的工作基础上再做些什么,于是就有了我在2009年5月对“二战”德国老兵的新一轮,或许也是最后一轮的采访。

7年前帮助我组织过老兵座谈会的布隆贝格的退休老市长和他的夫人又一次热情地帮助了我。他的夫人帮我落实了一批采访对象,并安排了周密的采访日程。走路已需手杖支撑的老市长亲自开车带着我在德国中部和北部海滨地区跑了一个星期,陪我逐个登门拜访了一批“二战”老人。

德国人的“助人为乐”通常具有明确的底线,那就是在花钱上一定要彼此分清。不知是老市长被我采访老兵的韧性所打动,还是为了答谢我在北京奥运会期间陪同他们夫妇游览黄花峪水长城的热情,他对我们沿途的用餐、渡轮和汽车加油等一系列费用的支出均采取了一种近乎“专制”的做法——必须由他一人来全部埋单。当我向他提出很德国式的“AA制”要求时,他给我的是一个很中国式的答复:“少来(Keine Diskussion)!”

只是在告别时他才对我说:“我觉得应该为你做点什么,你是在帮助中国人了解德国……”
了解德国——一个引发思考的命题。

我们对德国的了解有多少?这种了解的意义又在哪里?

这个诞生过黑格尔、康德、马克思、尼采等伟大哲人的睿智民族为什么曾由衷拥戴过纳粹的极权、专制和暴虐?这个滋养了歌德、贝多芬、巴赫等艺术巨匠的文明国家为什么曾一手制造出人类史上最黑暗和恐怖的种族灭绝罪行?是什么力量使这个国家在每次惨重挫败后都能再度



崛起并依然跻身于世界顶级强国之列？是什么原因使德国这个欧洲历史上的“问题孩子”变成了欧盟这一人类区域联合创举的核心驱动国？在大国之间的军事对峙长期威胁着人类生存的今天，德国人的“二战”经历和总结对今天的人类及其后代意味着什么？……

本书不求改变历史书的定论，只求客观、真实、生动地补充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和细节。能否为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应是考察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是否具备思想价值的判据之一，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做到这一点。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国家在召唤	(1)
崛起	(1)
义务——无法选择	(10)
为“保卫祖国”而战	(16)
第二章 走向军营	(27)
铁打的营盘	(27)
军官苗子	(32)
“纯爷们”的烦恼	(36)
第三章 血肉之搏	(42)
“大德意志师”一兵	(42)
永恒的伤痛	(51)
小连长	(59)
重创	(63)
第四章 硝烟轶事	(69)
败军的“杰作”	(69)
好运大兵	(74)
命运路线图	(80)
恐高的飞行员	(87)
画笔写春秋	(91)
第五章 纳粹卫队	(97)
我们是“多国部队”	(97)
曾经骄傲	(103)
精英梦破	(108)
恐怖双闪电	(115)



第六章 孩子兵	(122)
临危受命	(122)
“婴儿师”的覆灭	(127)
教授的往事	(132)
在战火中成人	(138)
海岛小兵	(144)
第七章 燃烧的家園	(152)
火从天降	(152)
后方少年的记忆	(160)
小城之灾	(170)
第八章 战乱中的女性	(176)
国防军女助手	(176)
按计划成长	(183)
妻子在后方	(187)
大逃亡	(193)
第九章 “卖国”英雄	(202)
大将之家	(202)
是英雄还是叛徒?	(207)
独目刺客之沉浮	(216)
第十章 铁丝网记忆	(228)
“莱茵大营”之谜	(228)
目标——西伯利亚	(237)
穿越炼狱	(246)
人性的光辉	(256)
第十一章 远方回声	(265)
阵亡通知书	(265)
前线寄来的遗书	(272)
伏尔加河畔的追寻	(282)
第十二章 解放者	(291)
从“卡廷惨案”到大驱逐	(291)
胜利之师在行动	(298)
战利品——女人	(308)



第十三章 另类解读	(321)
德军面面观	(321)
国防军之罪	(331)
“澄清派”的追问	(340)
《游击队之歌》	(344)
第十四章 再生之路	(351)
从“零点”开始的日子	(351)
精神的崛起	(356)
后 记	(362)

第一章 国家在召唤



崛起

布隆贝格(Blomberg)是位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边缘地区的一座富有传统的古老城市,至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它的名称取自德语的“Blumberg”,翻译成中文就是一个十分浪漫的名字——“花山”。

花山是个人才辈出的小城,曾涌现出很多驰名德国的名人,其中有园艺师、棋手、学者、作家、政治家……而最负盛名的当属联邦德国的第七任总理施罗德。

人杰地灵的花山市位于丘陵地带,山水清秀,满目葱茏,风格各异的民居小楼分布在老城内外,显现出典型的德国西部小城的特征:富裕、精致、秀丽、宁静。这种世外桃源式的环境很难让人产生关于战争的联想。

在刚到德国不久的一次聚会上,柏林工大的一位老教授告诉我:1945年初他进了盟军的战俘营后,曾有几个美国士兵先后问过他:“你们生活这样的环境里为什么还要打仗?”在未经战火破坏的德国村庄中,这些美国大兵第一次领教了德国人精致的生活质量。他们想不通,这些日尔曼人还想要什么?德国为什么甘愿冒着把如此美好的家园置于战火之下的风险去发动战争?英国历史作家比弗也曾描述过苏军士兵在进军柏林途中的怒吼:“德国人的日子原来过的是这么好,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去毁掉我们的家?”

宁静秀美的花山在“二战”期间属于一座非常幸运的德国城市。它地处德国西部疆域,没有遭受过东线苏军在反攻德国时的冲击,因而躲过了苏军的强奸与掠夺浪潮。另一方面,人口的稀少、军事价值的缺乏以及以农牧和手工业为主的经济构成,又帮助这座小城避开了盟军的空、地打击。花山在战争中只经历了社会震荡,而没有遭受过战火摧残和征服者蹂躏。“二战”带给这座小城的一切痛苦都是间接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征兵带来的影响。

在“二战”期间,花山的男人只有三种:打过仗的,正在打仗的,将要打仗的。在这场与众多世界强国为敌的大战中,德国必须要把全部身心健全的男子送往火线。和很多德国城市一样,小城花山至今保存着两份名单。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一去不返的两代死亡军人的名单。在“一战”中,人口不足4000人的花山市有180人阵亡或失踪;在“二战”中,在人口近5000的花山市里,青壮年男子几乎系数被征入伍,其中有310人阵亡或失踪。在这个名单中,就有花山市前任市长迪特·马亨唐茨的父亲——弗利德里希·马亨唐茨。

2002年2月19日下午,我在花山市的前任市长家中和主人聊天。

客厅的一面墙完全由落地窗构成,坐在沙发上就能将主人家花园里的大片茵茵绿草一览无



余,园中松树的枝叶随着无声的小雨在微微摇曳,使人隐隐感到一种大自然的无声舒展。客厅内的家具和装饰显得洁净而典雅,不存在丝毫做作的豪华。显然,这一切和主人的收入高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反映出的是一种生活的品位和情趣。

老市长迪特·马亨唐茨有着绅士般的风度。退休赋闲后,他一直在家潜心研究历史。他的夫人英格利特是一个忙碌于教会公益事业的退休教师,性格开朗泼辣,办事有火一般的热情和风一般的速度。他们的独生子迪尔克是我的好朋友,他在上大学时选择了汉学,并在上海学过两年中文,在此期间,他给自己选择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马立克,人称“老马”。老马毕业后开始从事中德文化交流,现在北京的一家德国机构工作。在对儿子的文化爱好和职业活动的了解过程中,老市长夫妇也逐渐变成了中国迷,他们不仅知道自己的中国属相(先生属牛,太太属虎),还长期保持着每两年就要来中国走一圈的习惯。在家里,他们也经常会接待一些想了解德国小城市,参观普通德国家庭的中国代表团。所有这些因素和我采访“二战”老兵的计划加在一起,就有了“老马”一家为我召集的一次老兵座谈会,深谙历史的老市长也就成了我花山之行的第一个采访对象。



图 1-1 花山市老兵座谈会的组织者——老市长迪特·马亨唐茨和他的太太英格利特·马亨唐茨。

1939 年 9 月“二战”爆发时,迪特·马亨唐茨的父亲被征入国防军,当时的小迪特刚刚两岁,而在银行工作的父亲差一个月就要 30 岁了。由于父亲参军的时候他的年纪太小,他对父亲的认识主要来自照片。说到和父亲的接触时,他说只记得在 3 岁时看见过一个穿军服的人在家里卫生间解手的背影,那就是父亲本人留给他的全部记忆。

父亲参军后先驻扎本土,1940 年参加了进攻法国的行动。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打响后,父亲所在的部队在年底打到了莫斯科城下,德军的闪电战在那里首次受挫……

1941 年 12 月 31 日,花山的家家户户都在迎接新年。迪特的母亲收到了一封战地来信,信封上的笔迹不是父亲的,这让母亲立即产生出一种不祥之感。打开信封后,一张阵亡通知书赫然出现在母亲眼前。当时迪特眼看着母亲泪如雨下,却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悲哀和绝望的气氛中,母亲和 4 岁的独生儿子一起迎来了 1942 年。

和很多当时的战争遗孀一样,年轻的母亲没有再嫁,她决定独自把孩子培养成人。

母亲的目标达到了,迪特在哥廷根大学毕业后成为了花山市中学的一名优秀教师,负责体育、语文和拉丁语三门课程。他的田径运动才能尤其出众,1.75 米的身高,剪式跳高记录是 1.8 米,百米跑的最好成绩是 13 秒。在担任市长之前,他已经是这所名校的校长,很多被他带出来的学生后来都成了大器,默克尔内阁的前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就是其中的一位。

但对迪特的母亲来说,愉快的生活早已结束在 1939 年。她的结局也很悲惨。有一天,老市长在开车上班的路上遇见了因车祸引起的交通堵塞,在等待了很长时间仍然无法前行的情况



下,他终于失去了耐心,决定离开汽车去看看事故现场究竟是什么情况,结果他看见躺在肇事汽车轮下的死者正是自己的母亲……

老市长说:“战争给每一个德国家庭都程度不同地留下了阴影,消除它需要时间。我们这一代人彻底摆脱它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有义务告诉后代如何不再承受这样的悲哀。”事实证明,老市长做到了这一点。我和他的儿子迪尔克曾谈起过“二战”给德国带来的灾难,迪尔克的一句话令我大为震动,他说:“一切报应都是德国人自己招来的。”

在我们谈到了“报应”的责任归属时,老市长认为,德国的历史错误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和民众基础,把所有的事情都简单地归咎于几个独裁者未免失于简单。

他说:“很多人至今仍然认为:如果希特勒能在1939年9月之前死去,他就会被作为德国历史上的伟人载入史册。这句话其实代表了很多老一辈德国人的想法。换句话说,如果希特勒在实现振兴德国经济、消除灾难性的失业、突破《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夺回军事主权,以及完成把奥地利、苏台德等地区纳入德国版图等一系列计划之后,在发动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对波兰的侵略行动之前能够寿终正寝,他留给德国历史的便只有可歌可泣的辉煌成就,而后来的战争灾难也就不会出现。”

无论这种假设是否有意义,它至少反映了一点:相当一部分德国人至今仍然对纳粹德国在发动“二战”之前的行径予以完全肯定。那么,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直至1939年发动“二战”之间的所作所为对德国民众究竟意味着什么?



图1-2 祖孙三代当兵的人。

左:弗利德里希·马亨唐茨,1939年至1941年服役于纳粹国防军,1941年12月在莫斯科战役中阵亡。

中:迪特·马亨唐茨,1956年至1958年服役于联邦国防军,父亲的命运让他认定了一点:军队功能是保家守土,他反对有人为“二战”阵亡亲属戴上“为祖国牺牲”的光环。

右:迪尔克·马亨唐茨,1984年至1985服役于联邦国防军,他毁掉了自己所有的穿军服的照片。他说,15个月的当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苦闷的一段时间,因为他反对军队和战争。

作为教育学专家的老市长曾长期研读“二战”前后的欧洲历史,因为在德国凡涉及教育就离不开对两次大战历史的了解和分析。



他认为,“二战”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一战”历史的延续,而“一战”是欧洲列强的长期利益争夺的必然。在欧洲的历史上,德国不过是一个后起的强势争夺者。德国之所以在“二战”中失去道义,第一在于它在全球性厌战的大形势下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二在于它把种族灭绝政策融入了军事行为。

这使我想到了中国的“春秋无义战”之说。的确,在“一战”前的漫长历史中,信奉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欧洲列强在外交方面无一不推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独立”、“自由”、“主权”……都只适用于自身。为了自身利益的扩展,武力征服是它们对外使用的第一语言。对于这一点,被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的中国人体会尤深。说白了,德国无非是坏得比较迟,而且坏过了头。

要想了解德国民众为什么选择这个“坏过了头”的纳粹党,就必须知道“一战”给德国留下的是什么。对这一点,老市长给我做了一番简洁而清晰的勾画:

魏玛共和国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存在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德国在“一战”之后选择共和制,绝非民众民主意识的提高,而是出自在帝制崩溃后的一种对西方强国政体的无可奈何的机械效仿。“一战”失败的內因是国力的衰竭——德国已无法承受继续维持战争所带来的经济重负。这就注定了这个封建的、军国主义的德国在尝试民主体制方面会先天缺钙。另一方面,胜利的同盟国也根本没有给予德国丝毫恢复生机和滋生民主的机会。他们考虑的只是如何从战败的德国身上榨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如何阻止德国再度强大并重新威胁到他们的安全。

为了这个目的,欢天喜地的胜利者彻底瓜分了德国在海外的全部领地。德属东非大部分归属了英国和法国;德属西南非洲分给了南非联邦;新几内亚岛的德属部分被移交给了澳大利亚;萨摩亚群岛分到了新西兰手上;太平洋中部的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以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都转交给了日本。

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的陆军被压缩成为 10 万人,海军只允许有 1.5 万人存在,各种舰艇的总数只能有 36 艘,而空军则完全禁止存在。坦克车、装甲车、潜艇一律不允许生产。这样的军力就连平息一场国内的大范围武装骚乱都很困难,真正意义上的国防就更无从谈起了。除此之外,战胜国还规定莱茵河西岸地区要由协约国军队占领 15 年,莱茵河以东 50 公里内的范围一概作为军事真空区。胜利者由此建立起了他们和德国之间的一道宽阔的安全缓冲区,而德国面对装备精良、兵力雄厚的邻国宿敌已基本丧失了抵御侵犯的能力。

除了在军事上必须要使被打倒在地的失败者无法翻身以外,骑在德国身上的战胜国还毫不留情地扼住了老对手的经济咽喉。

《凡尔赛和约》使德国损失了 1/8 的领土、12% 的人口、16% 的煤炭产地和 50% 的钢铁基地,但在另一方面又规定了德国必须向战胜国总共支付 1320 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并以每年支付 20 亿金马克和 26% 的出口收入来予以兑现。向一个国库已被战争掏空,资源被强制缩小的国家索取如此巨大的赔款,这无疑是在把它逼向绝路。这不仅不可能催生民主与和平,而且一定会孕育出欧洲新的动荡和灾难。因为这种极端的压榨只能种下德国复仇的祸根。遗憾的是,能认识到这一点的欧洲政治家可谓凤毛麟角。当时在英国曾有一名国会议员孤独而固执地坚持着自己反对裁军的意见,他的理由是:德国在“一战”后所负担的过重赔款压力会衍生仇外情绪,将来可能演变成破坏《凡尔赛和约》的力量。这位议员就是后来的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

那么,德国人所处的经济困境到了什么程度呢?